

印度学者对中国的安全认知

司乐如

内容提要 “一轨”外交和“二轨”外交都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内容,前者有助于说明两国在政府外交层面的表现,对后者的研究则有助于了解在外交现象背后起作用的观念因素。本文的研究试图把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融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印度学者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本文通过提供关于“认知”的更为精确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并通过术语统计和定性的案例分析,深入印度专家的视角,深化人们对中印安全互动的了解。

关键词 认知 社会心理学 中印安全关系

一、导 言

现有关于中印安全关系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一轨”外交,通过研究领导人声明、政府白皮书和高官访问,了解双边安全关系及其互动。这种方法虽有优点,但容易忽略中印关系中其他重要的层次。^① 作为对其的补充,研究“二轨”

^① 迄今为止,随新民教授的著作《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是探索中印认知互动方面最全面的研究,参见随新民:《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国际政治科学》2010/4(总第24期),第25—50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外交有助于理解官方行为背后的核心价值观和真实想法。因此,研究“一轨”外交和“二轨”外交都有其重要性。即使是研究“一轨”外交,也不能只关注最高决策者,因为最高决策者并不是生活在真空环境中,他们会受到军事、科学和政治学等学术圈子的影响或压力,这意味着学者的观点对决策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一轨”外交的材料更易于收集。收集相关“二轨”外交材料,则会因语言不通、透明度不够等方面的障碍而困难得多。

社会心理学理论把人们在交流中公开表示出来的态度称为“公开的表态”,如政府在“一轨”外交中公开表达的立场就是“公开的表态”。在研究“一轨”外交中,学者常常会忽略“隐蔽的态度”的重要性。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试图探讨中印两国军事研究者、科学工作者和政治学者 1991至 2009年间在“公开的表态”和“隐蔽的态度”方面存在的安全认知转变。^①

“认知”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了解中国和印度军事研究者、科学工作者和政治学者如何看待对方的军队、安全交往、军事系统状况和安全议题,^②笔者期望获得对双方认知的准确衡量和清

①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参见司乐如:《中印安全认知变化的比较研究:以美欧出口管制调整为中心》,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② 本研究收集的印度期刊包括《防务评论》(*Defence Review*)、《今日国防》(*Defence Today*)、《印度防务评论》(*Indian Defence Review*)、《印度三军联合研究院杂志》(*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Journal*,简称 *USI Journal*)、《特里舒尔》(*Trishul*)、《烈火》(*Agni*)、《国家海事基金会杂志》(*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Journal*,简称 *NMF Journal*)、《印度地面战争研究中心杂志》(*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 Journal*,简称 *CLAWS*)、《国防与科技》(*Defence and Technology*)、《防务电子》(*Defence Electronics*)、《国防科学杂志》(*Defence Science Journal*)、《伐尤航空航天》(*Vayu Aerospace*)、《空军军力》(*Airpower*)、《战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印度季刊》(*India Quarterly*)、《印度外交事务杂志》(*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印度评论》(*India Review*)、《印度洋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dian Ocean Studies*)、《南亚调查》(*South Asian Survey*)、《南亚学报》(*South Asian Journal*)、《印度外交评论》(*India Foreign Review*)、《印度季刊》(*India Quarterly*)、《战略事务》(*Strategic Affairs*)等。笔者在进行统计分析时,挑选了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的印度期刊《印度防务评论》和《印度三军联合研究院杂志》。

笔者采访的印度军事研究者的工作单位包括: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简称 *DSA*)、印度三军联合研究院(*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简称 *USI*)、印度地面战争研究中心(*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简称 *CLAWS*)、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简称 *IPCS*)、印度空军(*Indian Air Force*)、印度陆军(*Indian Army*)、印度海军(*Indian Navy*)、《国防与科技》和《国防科学杂志》。笔者采访的印度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单位包括: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战略分析》和《印度季刊》杂志社。笔者采访的印度政治学者的工作单位包括: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简称 *ICS*)、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等。

晰判断。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文献评述和专家访谈。通过分析会议、文献资料和访谈,笔者发现中印专家在“公开的表态”和“隐蔽的态度”之间普遍存在较大的差异。

其表现之一是,印度专家在会议上和文章中往往高估印度的军事能力和作战意图,而在面访中,他们往往采取更克制的态度,强调印军在任何军事领域都面临军力不足的局面。如笔者2009年在印度参加新德里观察员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简称ORF)图书启动仪式会议时,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布拉杰什·米什拉(Shri Rajesh Mishra)就警告,印度在未来将面临着中国和巴基斯坦“两条战线的威胁”。但在采访中,他却说“挑战”不一定是指印度会被这两个国家“攻击”或面临同时进行的“战争”。笔者回到中国后,一位中国二炮军官提到布拉杰什·米什拉的这次讲话,认为它具有明显的挑战性。显然,中国和印度学者在“公开的表态”和“隐蔽的态度”方面的差异值得研究和关注。

从上述例子可见,中印双方的认知差异和沟通鸿沟甚大。对这两国专家的逻辑框架和思维转变进行分析,是研究中印安全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基础。“认知”(或称“知觉”)这个概念虽然比较抽象,但它还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概念。在谈到政府、领导人或某一行为体的感受时,这个词往往缺乏应有的分析精确性。本文试图提供界定“认知”的方式,找到衡量“认知”转变的方法。为此,本文将对相关内容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二、理论基础

(一) 杰维斯理论的优势

杰维斯(Robert Jervis)是从事国际关系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杰维斯在其研究设计中,确定了两个变量:一是微观层次的国家决策者的认知,这是研究中的自变量;另一个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行为,这是研究中的因变量。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决策者的错误认知加剧国家间冲突,甚至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认知”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人在受到刺激后进行选择、组织和判断自己接受到的信息的过程。当一个人接收到信息或者受到刺激时,他会产

生对这个刺激因素的感受。然后,人会理解认知到的信息,并根据这一理解对刺激因素做出反应。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是基于他对刺激的感受,而不是基于客观真实的刺激因素本身。如果一个人的认知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就会错误,从而做出错误的反应。因此,在决策过程中,认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

杰维斯的研究表明,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第一种情况是,作为对手的双方或其中的一方旨在改变现状,确有侵略和发起冲突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存在错误认知,冲突难以避免。在中印安全关系中,两国所有部门的专家都认为本国并不试图侵略对方或发起战争。但印度2009年在边界地区的增兵行动,以及其国内的反华呼声确实引起了不少中国安全专家的关注。最近几年,中国媒体对印度行动的评价也变得越来越严肃。与此同时,中国进行的军事现代化也招致不少印度安全专家的关注和批评。双方行为的相互作用自然会改变现状,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中印间会发生军事冲突,但双方行为的相互反应,可能会导致安全困境。为了系统衡量上面提到的反应,本文将比较与分析期刊和采访中军事系统提出的不同议题的数量。^②

在杰维斯所说的第二种情况下,双方都是维持现状国,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但冲突却还是发生了。杰维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决策者的错觉。“错觉”指由于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错误判断,导致其决策和行为偏离实际,从而使事物的发展与决策者的本来意图不相吻合。由于决策者对形势和对方的意图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往往是夸大对方的敌意,所以,他们会采取过分的行为。如果双方都是如此,敌意就会不断上升,冲突就会在双方都无意冲突的情况下爆发。这种情形是杰维斯研究的重点,它对于描述中印安全关系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③

它的意义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印双方之间的误解一直困扰着这两个国家。1962年爆发的军事冲突有很多诱因,但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是印方对中国的错误判断。印度把中国对边界问题的沉默态度看成是中国对其行为的默许。印度的“前进政策”基于其对中国的反应以及对自身实力的错误

①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40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判断。到目前为止,1962年边界冲突仍然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印度作为战败者的心态仍然延续在它和中国的交流中。据此,可以解释印度在有些方面采取的缺乏信心的行为,2009年印度在边界地区的增兵活动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但印度在边界地区的增兵行动不仅发生在2009年,印度在前几年也有类似的行动。不过,这一次中国专家的反应更为激烈。在这个反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专家对印度的偏见。一方面,这个看不起对方的态度来自于中国在60年代的胜利,另一方面中国专家的反应也是社会心理学逻辑起作用的结果,下文将要对此加以讨论。^①虽然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印度方面的认知,但有时候仍然不得不涉及中国专家的认知,以反映双方的互动与差异。

在提出理论假设之后,杰维斯进一步使用历史数据对决策者为什么会发生错误认知进行分析。他认为在国际政治领域,心理学理论中讨论的几个导致错误认知的重要机制同样起重要作用。首先是“认知相符”机制。人对世界的事物总是有着一定的认知,这些认知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形成了人接受新信息之前的原有知识。其次是“认知失调”机制。^②它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与自己先前一贯的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分歧时,为了保持自己认知的一致性,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虽然杰维斯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这两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但他还忽略了许多能够对国际关系研究有所助益的重要概念。下面我们会对这些概念进行分析,并把他们应用于中印关系的讨论中。

(二) 杰维斯理论的不足

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的心理学框架下,杰维斯忽视了许多社会心理学的有用概念。而且,他把认知分为“准确”和“错误”两种类型。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认知和客观实际不一致,但错误认知和正确认知都会影响行为体的判断,有时错误的认知比正确的认知对行为体更有影响力。实际上,由于认知具有主观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它是完全错误的。在中印关系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1962年在边界问题上的判断。印度政府的“前进政策”基

^①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7页。

^② 同上书,第37页。

于印方对自身军力以及对中军力和反应的错误判断。在这种情况下,错误认知有着很强的说服力,鼓励印军采取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行为。另外,错误认知不只是单方面的,事实上,印度对自己和对方能力的判断都是错误的。这样,印度形成这一认知的主观基础就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可见,杰维斯提供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我们对“二轨”外交的研究,但这个框架本身也需要进行改善。在杰维斯的研究中,最受重视的概念是“认知失调”。此外,他还提到了其他一些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如“愿望思维”、“认知相符”,等等。在这些思维基础上,很容易形成“安全困境”,其含义是,“一国增强军备会降低自我不安全感,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其他国家以同样方式加强其军备,从而导致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最后所有国家都因为增强了军备而感到更加不安全”。^①

在中印的互动中,“安全困境”逻辑有一定的说服力。印度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行为和意图存在一定怀疑,并感到某种威胁。另一方面,像印度在1998年进行的核试验一样,无论是否有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且无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否针对印度,印度的军事研究者、科学工作者和政治学者都可能会夸大这一威胁。因为威胁越大,军事部门、科学院、研究机构就能受到更大的重视和获得更多的资助。任何国家的国防开支都依赖于这些感受到的或预测中的威胁。

下面讨论的一些社会心理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杰维斯提供的研究框架,并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认知分析工具。社会心理学工具和国际关系学话语的融合有助于建立新的研究平台,深化我们理解国家各个层次的内容,包括“一轨”和“二轨”外交。

三、理论进展

(一) 内部归因错误与外部归因错误

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1958年提出解释行为体互动的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重视内部因素,即行为体的“气质归因”。第二种逻辑重视外部因素,

^①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13页。

即行为体的“情境归因”。^① 当解释对方的行为时,行为体会倾向于用对方的缺点来解释它所采取的行为。而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行为体倾向于强调自身所面临的环境因素。这两种情况造成的客观结果是,行为体能减轻自身所承担的责任,并强化对方的责任。按照“错误归因”(misattribution)的逻辑,如果中印研究者的归因方式是错误的,就会造成“错误一致效果”(false consensus effect),使错误的判断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并影响决策者对对方的判断。李·罗斯(Lee Ross)研究了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错误归因”。认为行为体对对方的判断与他们的身份密切相关,但对方的身份有时并不足以使人们确定对方的“认知判断”。^② “基本归因错误”和“认知失调”的相似性在于,他们都试图找出解释自身行为的原因。两者不同点在于,前者会涉及对方的行为,而后者则只专注于自身。它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对方的行为与自己的行为是一致的,行为体却依然会指责对方采取的行为。

笔者采访时发现,中国和印度专家对笔者的美国身份的“认知”会影响他们的表现和答案。一方面,由于笔者的美国国籍,在我提出关于中印安全关系问题时,中印专家会自然地提到他们对美国行为的观点。另一方面,由于笔者的美国国籍,在我提出关于中印安全关系问题时,中印专家会视我为旁观者,而更愿意提及对对方的不满。另一个例子来自笔者2008年10月在莫斯科参加《我印中美安全问题圆桌会议》的经历。^③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不仅人数少,而且他们在会议上没有说一句话。笔者接触到的印度与会者认为,中国专家的反应表明他们并不重视印度或中印关系。与此同时,笔者接触到的中国与会者则指出,他们的俄文水平高于英文水平,因此他们能更方便地与俄罗斯专家交流。而且,这些中国代表是经济方面专家而不是安全专家,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在会议上发表看法。以上两个例子表明,“基本归因错误”是一个多层次的,经常发生的问题。

“基本归因错误”最常见的表现是,行为体在解释自己的行动时一般会找

①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② 同上书,第88页。

③ “Russia-India-China-USA Roundtable on Security Issu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oscow, Russia October 16-17, 2008.

出环境方面的因素和理由,即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情景化”解释。^①与此相反,在解释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时,他们会归之于对方本身的因素,即“指责”他人。不少印度专家认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源于印度的国防需求,并带有防御色彩。针对中巴军事合作,多数印度专家提到下面要讨论的“两条战线威胁”,并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来自其主导本地区的愿望和改变现状的意图。另一方面,印度专家又用“认知失调”和“基本归因错误”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核试验。西藏问题为另一个例子。印度专家往往认为西藏地区的民用设施建设是两用性的,能够发挥针对印度的作用。

(二) 二手偏见

二手偏见意味着第三方对行为体的观点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手信息缺乏会使行为体难以通过现实环境了解对方的行为,并导致误解的产生。“二手偏见”对中印安全关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印专家往往通过美国人的研究和报告来了解对方,印度专家尤其如此。相对来说,中国专家更容易阅读印度专家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主要是用英文写作的,而中国的许多文献是用中文写成,会中文的印度专家,如印度国防与分析研究所专家谢钢(Srkanth Kondapalli),只是印度学者中的少数。虽然学习中文的印度学生日益增多,但他们对双方安全关系的影响还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一方面,这些学生还在学习阶段。另一方面,他们的学习方向更多是经济方面,对双方的安全关系不一定会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比如,在2009年5月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印大学生论坛》上,会汉语的印度与会者一般不愿谈论安全上的难点问题,而主要只是关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等方面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可以增强互信,但不能忽视双边关系中的难点问题会影响政治经济关系。尽管如此,中印青年学生的这种直接交流还是可以看作消除“二手偏见”的第一步。^②此外,双方之间的交流也在扩大。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和印度三军联合研究院每几年都会派专家到中国进行交流。但这些专家一般接触到的是中国研究印度问题的专家,这些印度问题专家在中国整个军事、科技和学术界不一定

^①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87页。

^② “Sino-Indian University Students Forum,”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May 2009.

有很强的代表性。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印度专家发表文章中的大多数注释来自于美国的报告、文章和书籍。这使美国专家的偏见和看法比较容易塑造中印专家之间的互动。印度军事研究者对中国的所谓“电子战”和“网络战”的兴趣,往往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认知和担忧。由于印度专家“感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印度的军事现代化也扩大了对电子战攻击的应对和准备。虽然中方的军事意图并非针对印度,印方还是把美方的不安全感当成了自己面临的威胁。下面的讨论将会谈到,一些美国专家的“中国威胁论”通过“二手偏见”的方式强化了印度专家对中国的怀疑和担心。上述一手信息缺陷现象的最明显例子是,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了六十多篇提到《超限战:中国摧毁美国的大战略》的印度文章。^①虽然这本书只代表两位中国军人的观点,但印度专家把这本书的战略意义看得特别重要。由此可见一方面,这些印度专家缺乏其他可供研究的中文材料,另一方面,这篇作品也符合他们反华的“先入为主偏见”。

由于信息的贫乏,印度专家经常依赖一两个中国专家的说法、一两篇文章或一两个较保守的网站,如《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或《环球时报》来了解中国的整体看法和对印度的战略意图。此外,他们也经常依赖西方的信息来源,尤其是美国学者的报告和材料,如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比尔·格茨(Bill Gertz)等对中国持较强硬态度的美国专家。可见,印度专家中存在着严重的“二手偏见”问题。^②

在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安全行为方面,西方对印度专家的影响在上面的定量分析中显得很突出。由表-1可见,印度专家对W-88核弹头设计、“出、联”)核装备、材料和技术内容等方面的关注,反映了其对西方报告和西方媒体相关判断和分析的依赖。这种依赖表明印度缺乏相关的具体信息,印度对中国核项目的了解基本上来源于西方。这种依赖还保持着一个特点,即在选择他们试图强调的信息时,不少印度专家会选择颇为极端的案例来进行说明,而且往往不

① Col Qiao Liang and Col Wang Xiangshui *Unrestricted Warfare: China's Master Plan to Destroy America* (New Delhi: Natraj Publishers, 2007).

② Vinod Anand “Chinese Concepts and Capabilities of Information Warfare,”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0, No. 4, October-December 2006, p. 790

表-1 1991—2009年印度期刊对中国核军事系统的关注

军事期刊—核军系统 (提及次数)		科学期刊—核军系统 (提及次数)		学术期刊—核军系统 (提及次数)	
(出、联)核装备	84	战略、战术核武	21	战略、战术核武器	101
战略、战术核武器	61	(出)核装备	14	(出、联)核装备	92
弹道导弹装备和技术	7	晋级(094)核潜艇	10	(出)东风-11	65
W-88核弹头设计	6	东风-21导弹	9	(出)东风-15	17
东风-5/5A 导弹	6	东风-31/31A	9	(出、联)WMD	16
(出、联)核试验	5	C4 ISR系统	9	(出)环形磁铁	14
(出、联)恰希玛核反应堆	5	夏级(092)核潜艇	8	W-88核弹头设计	4
轰-6(H-6)轰炸机	3	东风-3/3A 导弹	6	(出)恰希玛核反应堆	6
晋级(094)核潜艇	3	宋级(039)核潜艇	5	(出、联)UF6	3
(出、联)环形磁铁	2	W-88核弹头设计	1	(出)高浓缩铀	3

资料来源:《印度防务评论》、《印度三军联合研究院杂志》、《国防与科技》、《国防科学杂志》、《战略分析》和《印度季刊》,时限为1991至2009年。

提醒读者这类信息可能不正确,这样,来自西方的报告就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息。在谈到中国对其他核项目的影响时,一些印度专家把中国的行为视为推动巴基斯坦、朝鲜、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利比亚、伊朗等国家和地区核武器考虑和项目的重要因素。虽然许多西方研究也谈到中国停止生产裂变材料或中国的核不扩散承诺,但这些方面不仅受到较少关注,而且印度专家还怀疑其真实性。反而盗窃W-88核弹头设计和类似不一定可靠的信息却成为了他们眼中的“事实”。^①

印度的“二手偏见”还渗透到其对中国核现代化的整个体系的想法,并使印度专家对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保持一定的关注和担忧。^②如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所长迪班卡·巴纳吉(Dipankar Banerjee)在1996年的文章中指出,“尽管受到国际压力,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延伸,北京还继续通过进行核试验表达它进行核武器库现代化的决心。中国目前正在研发三种新的核携带系

① Alistair Iain Johnston, et al., “The Cox Committee Report: An Assess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December 1999, <http://iis-dh.stanford.edu/pubs/I0331/cox.pdf>

② Brigadier Gurneet Karwal “India’s Nuclear Force Structure,” *Strategic Analysis*, Vol XXIV, No 6 September 2000 pp. 1046-1047

统,东风-31、东风-41和东风-31潜射弹道导弹。这些都将是先进的远程固体燃料火箭,并且是中国下世纪核威慑力量的至关重要的部分。一直到中国能确保这些武器的可靠性为止,它还会继续进行核试验。因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后,中国才会停止核试验,而不会在准备签订时就早早停止……北京的行为与正常外交惯例的差距,表明了其拥有永远保持现代核武库的决心”。^①这段话不仅反映了印度专家对中国核不扩散承诺的怀疑,也反映出他们对中国所谓“言论和行动的差异”态势的“先入为主偏见”会导致哪些误会和对中国行为的错误判断。

(三) 过度自信现象和受害者心态

在行为体对自己的立场保持过分的信心时,会出现“过度自信现象”。^②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体以为他们所采取的决定和判断是正确的,并难于调整或改变自己的立场。中国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上的胜利和印度的失败导致了中印之间的“先入为主偏见”,并诱发双方在安全互动上出现“过度自信现象”和“受害者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下,为了吸引中国的关注和重视,印度专家一直倾向于使用带有挑战性的行动和语言。

与此同时,中国专家往往不承认印度所认定的威胁。针对中国专家低估印度的威慑和挑战能力,印方的反应是努力寻找让中方尊重它的新方式。上面提到过印度准将认为中国只愿意“尊重实力”,而笔者采访的一位中国军官则指出,印度在任何领域都比不上中国。可见,在中印安全领域,经常会出现中印构建的“自信受害循环”。在中印安全互动上,“受害者心态”和“过度自信现象”这两个概念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双方的表态,来了解这两个概念的互动。200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赵恒在其博士论文的结论中指出,“从以上内容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印关系中的核问题完全是印度一手制造出来的,中国是被动地拉入到这个充满情感、不安、复杂、甚至是危险的领域”。^③赵博士把威胁感产生的原因都归结为印度方面,并没有承

① Dīpankar Banerjee,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Asia,” *Strategic Analysis*, Vol 14 No 1, 1996, pp 57-58

②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109页。

③ 赵恒:《印度核政策的历史分析》,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5年。

认“认知”可能导致的偏见。他也并没有提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作用。类似的说法不仅缺乏讨价还价的空间,也容易导致双方之间的敌意。笔者在采访一位中国科学家时发现,他认为中国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承诺是中印双方都早已接受的立场。而在采访印度专家时,笔者发现他们的立场恰好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并不想解决边界问题,而是试图利用类似争端来牵制印军和遏制印度在南亚地区之外的行为。这样的判断来自于他们经常保持的“受害者心态”,并认为中国的“过度自信”表明中国一直以来不愿意修正自己的行为。虽然中国的一些专家认为印度专家对自己国家的竞争力经常采取自信或自大态度,但同时这个态度也是隐藏“受害者心态”的一种方式。

针对印度 2009 年的增兵宣言,笔者采访的一位中国政治学者指出,中国会保持克制的态度和低调的反应。他认为“像孩子和父母关系一样”,印度采取的挑战性策略不会招致中国的反应。笔者采访的另外两位中国政治学者也指出,在任何军事领域,印军都绝对比不上解放军。无论类似观点的逻辑性如何,这些专家的说法还保留着比较明显的“过度自信”色彩,并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引起印度专家的注目和反感。

由于美国因素的介入,特别是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美国解除对印度的制裁,中印“过度自信”现象与“受害者心态”之间的互动可能会发生变化。中国专家不仅面临印度的“受害者心态”,也面临着美国的“过度自信”现象。笔者通过阅读学术期刊和对专家的访谈发现,这对中国专家对印度的关注和反应会产生影响。在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时,他在四分之三时间里谈了美国因素和行为。而每次到印度进行采访时,笔者都发现关于中国的会议不仅数量很多,而且中国因素也往往会出现在不以中国为议题的会议中。这一现象在许多方面类似中国专家在安全讨论中对美国的态度。因此,不能忽视美国因素的介入对中印双方长期安全互动的影响。

(四) 先入为主偏见

希尔顿(Hilton)和冯·希佩尔(Von Hippel) 1990 年的研究发现,对同一个信息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解释方式。这两个学者提到的案例是,媒体报道经常导致听众不满,这是因为行为体会感到任何不支持自己立场的报道都带有偏见

性,同时,他们的这种反应也带有自身的偏见性。在中印交流中“先入为主偏见”非常明显。对中国专家来说,印度在1962年的失败、印度国民的贫困、印度延误和取消的军事项目等等,都表明印度是世界体系中的弱者。在中印交流当中,边界争议难于克服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双方明显的“先入为主偏见”。双方对边界地图和冲突历史的认知非常不一样。由于双方都建构了自己关于边界争端的“神话”,使它们的立场保持了某种坚固性,从而形成了某种“信念顽固症”。^①

无论中国专家如何提及“和平崛起”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概念,印度学术、科技和军事研究者还是按照历史上的案例和它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来判断中国是否会在边界上采取“教训政策”以应对挑战。在学术文献和访谈中,印度专家经常提到中国在历史上与越南、俄罗斯和印度发生过的冲突,以此证明中印边界摩擦会再次发生。^②在分析中国的“工具性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行为时,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所长迪班卡·巴纳吉指出,“……中国对中国南海上的态势。问题不是这个争端的合法性,而是中国对问题的态度,而且它的反应导致担忧。从1974年的把握时机夺取西沙群岛的行动到1995年夺取美济礁群岛的尝试,中国一直追求一个精心设计的政策。从1988年夺取越南的南沙群岛以来,中国确立了对更多群岛的领土权……。”^③与巴纳吉一样,许多印度专家用类似案例来预测中国在中印边界上的意图与策略。

在中印关系中,中印在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源于客观和主观的因素。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支持促进中国参与了“万隆会议”。当时,印度认为自己的世界地位要高于中国,在1962年,印度同样认为自身的实力强于中国。边界上的互动和“前进政策”的施行增强了印度对自身的信心。印度专家的自强意识形成了某种“信念顽固症”。但是,印度在边界战争被打败之后,双方的主观地位发生了决定性的调整。这一调整加深了双方对对方的

①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101页。

② Colonel G. D. Bakshi “The Sino-Vietnam War 1979: Case Studies in Limited War” *Indian Defence Review*, Vol 14, No 2 July-September 2000 pp. 99-107 Sreedhar “China Becoming a Superpower and India's Options” *Strategic Analysis*, Vol 20 No 4, July 1997, pp 533-542

③ Dipankar Banerjee,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Asia” *Strategic Analysis* pp 57-58.

偏见,并建立起了新的“信念顽固症”。两年后,中国的核试验和世界对中国核国家地位的认可,以及几十年后中国的崛起都强化了中国是强者而印度是弱者的偏见。

谈到印度专家如何看待中国军事现代化时,印度专家主要关注中国的军售,并强调中国提供给印度邻国(尤其是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虽然仍然存在“中国威胁论”,但其主要来源并不是中国本身,而是中巴安全关系对印度的所谓“包围”威胁。按照印度军事研究者的认知,印度面临着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两条战线威胁”。印度在不同时期都有文章认为,“中国的首要利益是通过保持独立、强大、具有足够信心的巴基斯坦来构建对付印度的‘两条战线威胁’”。^①可见,这一概念的使用具有延续性,是印度关于中印巴关系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

表-2 1991—2009年印度期刊对中国空军议题的关注

军事期刊—空军议题 (提及次数)		科学期刊—空军议题 (提及次数)		学术期刊—空军议题 (提及次数)	
包围—中巴关系	67	包围战略—中巴关系	18	边界问题—中印	68
边界问题—中印	52	崛起、超级大国	15	包围战略—中巴关系	54
基础设施和物流	45	边界问题—中印	15	基础设施和物流	44
边界冲突的可能性	35	包围战略—中孟关系	8	信息化、网络、电子	17
中国的“教训战略”	5	中巴威胁论	7	中印边界冲突可能性	14
“自产、自主”	5	针对中国的军售禁令	7	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	14
针对中国的军售禁令	5	信息化、网络战	3	1991年伊拉克战争	13
信息、网络、电子	4	军事、军购透明度	3	针对中国的军售禁令	13
中国军事透明	4	中印边界冲突可能性	2	“两条战线”战争	9
中国“空军战略”	3	中国对印遏制	2	中俄改善、中印摩擦	7

资料来源:《印度防务评论》、《印度三军联合研究院杂志》、《国防与科技》、《国防科学杂志》、《战略分析》和《印度季刊》,时限为1991至2009年。

① Sujit Dutta “Beyond the Special Relations” *Strategic Analysis* Vol 16 No 8 November 1993 p 1099. Major General G. D. Bakshi “Post Elections Scenario: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dian Defence Review*, Vol 24 No 2, April-June 2009 p. 138. Bhashyan Katsuri “China’s Defence Strategy.” *Indian Defence Review*, Vol 10 No 2 April-June 1995 p. 38.

印度专家对中国军事行为最明显的“信念顽固症”与中巴安全关系有关。印度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印度在亚洲地区最大对手,中巴合作是印度安全研究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部分。由表-1和表-2可见,印度专家对中国军事出口巴基斯坦和中巴安全合作有着高度的兴趣。在印度专家的认知中,中巴包围议题和中巴威胁相互连接。例如阿伦·维斯拉卡尔马(Arun S. Vishwakarma)就认为,“不能孤立地考虑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核升级。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和核姿态是中国的代理”。^①印度政治学者K·素布拉曼尼亚姆(K. Subrahmanyam)也认为,“中国想把印度降到地区大国的地位。中国似乎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决定利用印巴之间的竞争来获益,为此,中国扶持巴基斯坦,提升巴基斯坦的军事潜力,通过扩散核武器和导弹等方式使巴基斯坦制衡印度。由于印度无法向北部的俄罗斯投射实力和影响,也无法向东部位于美国核保护伞下的日本投射实力和影响,印度因而不得不寻求向南寻求扩张实力和影响。这种格局可以解释中国何以增加对巴基斯坦、缅甸和海湾地区的关注,即中国似乎选择了一个间接策略来对付印度,即不采取表面上的敌对行为,而是通过代理国家来遏制印度”。^②

据笔者所接触到的印度专家的理解,间接策略之所以能降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面临的压力,是因为印度为了对抗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军费和军力自然会被分散。在“两条战线威胁”下,印度专家的分析更多地关注陆军在理论和原则上如何面对两国的挑战,而较少谈到具体的军事系统和军事装备的作用。在讨论中,中国改善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四川省的基础设施受到印方最大程度的关注和重视。弹道导弹部署、机场建设、铁路延伸和其他的设施改造也都受到关注,但关于细节的讨论非常少。^③为了预测中国现在和将来的行为与立场,这些研究往往利用60年代和70年代的框架来分析现代中国,主要依据历

① Arun S. Vishwakarma, “Way to a Credible Deterrent,” *Indian Defence Review*, Vol 24 No 1, January-March 2009, p 45

② K. Subrahmanyam, “Nuclear India,” *Indian Defence Review*, Vol 13 No 2 April-June 1998, p 13.

③ M. J. Vinod, “India-U.S.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trategic Analysis*, June 1997, p. 445; Harsh Pant, “India Debates Pros and Cons of Missile Defence-I,” *Defence and Technology*, January 2006, pp. 40-45; Maj Gen Dipankar Banerjee, “Evolving a Nuclear Policy,” *Journal of the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of India*, Vol 148, No 533, July-September 1998, pp 382-447.

史上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边界冲突、中越边界冲突、中越南海冲突等案例。印度专家经常提到毛泽东思想,以表明中国在解决边界和其他争端中会采取武力措施,并预测中国未来在中印边界上会再次进行“攻击”。这种倾向是典型的“信念顽固症”和“先入为主偏见”的反映。它在接受笔者采访的一位印度学者的结论中也有所反映,这位专家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印度最大的威胁,比巴基斯坦的威胁还大。他的逻辑是:由于印度专家不了解中国的意图,因而印度总是会受伤害,双方发生摩擦或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五) 敌对性攻击与工具性攻击

在国际关系中,很少将攻击分为不同的种类,但在社会心理学里,攻击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是“敌对的”(热)攻击,而第二种是“工具性的”(冷)攻击。^①前者源于行为体的愤怒,后者源于行为体的实用目的。但社会心理学并没有探索这两种情况是否会同时发生。按照社会心理学的定义,恐怖主义经常被视作“工具性”(冷)攻击。虽然实行自杀攻击的一些人其行为可能是基于个人的愤怒,但这些行动一般要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够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整个行动被认为是“工具性”(冷)攻击。攻击有很多类型,不一定都通过武力进行。针对软实力目标的攻击也会发生,比如在印度国内,反美活动也会伤及美国的不少软实力目标,如饭馆、宾馆、公民等。由于一些攻击者无法直接伤害到美国本身,他们就选择代表美国的目标。攻击的行动有时也不一定针对本来的目标,而是转向另外一个替代目标,这种现象被称作“位移”。在印度的案例上,“位移”现象比较突出。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威胁感和愤怒情绪往往转嫁给中国,反之亦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专家强调巴基斯坦的军事现代化包括核武器项目,都来自于中国的军用和民用援助。由于中巴军事合作影响印度的安全,所以当巴基斯坦采取任何威胁到印度利益的行动时,例如所谓的支持恐怖主义或分裂分子等事件,印度专家经常会提到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一位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政治学者认为,由于印度对中国的了解不如中国对印度的了解,印度把中国看成更大的威胁。

^①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381页。

社会心理学对“敌对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印不对称认知及其逻辑框架。在1962年的边界冲突中,中国的立场是“工具性攻击”,即中方以克制的行动实现边界上的目的。在1962年的冲突中,一旦实现恢复“实际控制线”的目的后,中国就撤军了。在印军在2009年宣布在边界地区增兵的计划时,中方按照同样的“工具性”立场,并没有采取挑战性的行动或做出强烈反应。但在未来,当印度再次推行“前进政策”时,中国不一定会永远采取这样的立场。

与此相反,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行为更具有“敌对”色彩。印度国内的反华气氛是印军获取资金和采取新军事行动的推动力。“中国威胁论”也是印度陆军解释“东向”政策下的军售、边界上的增兵行动、国际市场上的军购等行为的工具。虽然这一解释方法对于促进国内团结、增强国际同情和增加军费具有一定的“工具”作用,但其危险在于,类似的民族主义很容易导致“敌对性攻击”的爆发。虽然“中国威胁论”本来只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种主观反应,但后来这个理论却变成印度“社会身份”中不可分离的概念。^①在笔者考察的所有关于中印安全关系的文章中,“中国威胁论”都占据其一部分内容。由于陆军开支占印度军费开支的比例超过50%,因此,其他军事部门也都不得不强调自己所面临威胁的紧迫性以吸引政府的关注。由表-2和表-3可以发现,“包围”这个词经常被提及。不过,我们并不应该认为所有印度专家强调这种威胁感都是为了吸引资金。由于印度专家比较偏向于从“敌对性攻击”的角度来认识中方的行为,我们不能排除他们的威胁感中所存在的真实性。

^① “社会身份”在国际关系当中有一定的描述作用,尤其是因为各国面临“组织内”(in-group)和“组织外”(out-group)的偏见。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简称SAARC)、上海合作组织等都是国际社会中的组织。在中印关系中,这些组织的成员身份有着重要的意义。印度专家一般认为,中国试图阻碍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常任理事国,并限制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不少印度专家指出,印度也只会允许中国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国。在上述组织身份和框架下,中印能够限制对方对自己实力领域的影响。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的身份也有过一致的时候,比如在西方的制裁下,双方都曾经是被排除在世界军售市场外的国家,并使俄罗斯成为双方最大的供应国。在西方解除制裁后,印度又成为世界军售市场的一员。尽管如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还是比印度更为广泛。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面临着组织内和组织外的区分所造成的“有利于集团的偏见”。

(六) 修订历史

“修订历史”的概念基于很多社会心理学者的研究,包括 1970 年达瑞尔·贝姆 (Daryl Bem) 和基思·麦康奈尔 (Keith McConnell)、1976 年 D. R. 魏科森 (D. R. Wickon) 和詹姆斯·莱尔德 (James Laird), 以及 1977 年乔治·瓦兰特 (George Vaillant) 所发表的作品。“修订历史”意味着行为体在面临与自己的了解或判断相矛盾的信息时,会修订自己的历史以满足自己的逻辑需求。

“修订历史”会带来多种后果,其中包括“错误信息效应”。为了把历史修订为有利于行为体了解自己的状态,历史上的客观信息会发生变化。中国和印度对 1962 年边界冲突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专家一般认为中国在冲突中保持克制的立场,并且一旦收回印度在“前进政策”下攫取的领土,中国部队就撤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迄今为止,中国专家一般认为中国正在实行克制的态度,并按照邓小平所支持的“让一点”的一揽子方案解决边界问题。^① 在 2009 年的采访中,中国专家强调中国在边界上的克制姿态。但与中国专家的认识相反,印度专家往往提到中国陆军每年进行的“针刺侵入”,并认为这是一种“腊肠切片”式的慢慢收回领土的方式。

除上述“错误信息效应”外,“启动”效应也会经常发生。“启动”的含义是指事件或行为体会在记忆上通过一些“特定连接的激活”而导致反应。^② 行为体使用的议题也会导致不稳定的连接和反应,从而引发威胁。这些连接一旦出现,就很难控制。这一效应的存在就意味着,印度专家和政治家利用“民族主义”反华以加强内部团结等做法,其本身会导致舆论的恶化,由此产生的人民对政府的压力可能会导致进攻性行动。为了分析“启动”效应对中印军事研究者、科技工作者和政治学者的影响,笔者分析了双方使用的“议题”,这些议题在论文和采访中的出现构成了某种“启动”效应发挥作用的基础。比如,在中国军事期刊上,专家们经常提到印度的地区霸权主义、对印度洋的控制意图、民族主义等。

① 张敏秋:《中印关系的改善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际政治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27 页。

②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 105 页。

表-3 1991—2009年印度期刊对中国陆军议题的关注

军事期刊—陆军议题 (提及次数)		科技期刊—陆军议题 (提及次数)		学术期刊—陆军议题 (提及次数)	
边界问题—历史	132	基础设施—西藏、四川	26	边界问题—历史	152
内政—西藏、新疆	75	包围—中巴安全关系	18	内政—台湾问题	66
中、巴威协论	67	超级大国、崛起	15	超级大国、崛起	63
基础设施—西藏	45	包围战略—中缅关系	15	中、巴威协论	61
冲突可能性—边界	35	边界问题—中印	15	毛泽东思想	58
扩展和霸权野心	35	内政—西藏问题	13	内政—西藏问题	53
内政—新疆问题	34	内政—台湾问题	10	扩展和霸权野心	49
支持分裂、恐怖	23	包围—中孟关系	8	基础设施—西藏	44
包围—克什米尔	18	边界问题—历史	8	内政—稳定、人权	39
包围—中美关系	14	内政—新疆问题	7	内政—新疆问题	37

资料来源:《印度防务评论》、《印度三军联合研究院杂志》、《国防与科技》、《国防科学杂志》、《战略分析》和《印度季刊》,时限为1991至2009年。

由表-3可见,印度专家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关注非常明显,超过对所有其他领域问题的关注。在笔者的统计中,“边界问题—历史”被印度学术期刊提到152次,被军事期刊提到132次,并在印度期刊对中国陆军议题的关注中占有最大的比例。由于印度政府的军费开支主要部分投资于陆军的发展,而且大多数最著名的和最有影响力的印度思想库的专家也来自于印度陆军,所以大多数有挑战性的分析和观点都针对中印边界争端。在从1991至2009年的材料中,所谓“中国威胁论”和“巴基斯坦威胁论”的连接、“两条战线的威胁”战略、中国的“霸权主义”、中国对印度的“包围战略”、“1962年的可耻的失败”等观点和论调,都经常反复出现。从统计上说,印度专家对中国的担忧、相关的议题和主要的分析都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这些观点的内容常常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笔者在阅读文章时往往要看封面才能知道文章发表在哪一年。

从“修订历史”的角度看,在印度专家的研究中1962年的边界冲突被反复地探讨。笔者采访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时,他强调中国的最大缺点是不愿意探索历史。笔者在观察中发现印度专家倾向于繁复地探索历史。对历史背景的认识和了解是任何研究的基本需求,但始终离不开历史也阻碍了发展的可能性。在边界问题上,印度专家一般认为中国陆军在边界上的任何行动都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而且中国还在进行毛泽东时期所从事的

“解放世界”的活动。从 1991 至 2009 年,中国的所谓“扩张意图”、“霸权主义”、“动武行为”、“军事主义”、“民族主义”这些概念在相关论文中不断出现。表-3 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

上文的情况也充分反映出印度专家的另一个比较普遍的“基本归因错误”。虽然印度专家在撰写的文章和采访中往往提到中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关于边界问题的研究上,本身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印度专家 1991 至 2009 年的文章以及 2009 年笔者参加的会议上,边界上的“侵入事件”、“两条战线”威胁、冲突的可能性等说法都反复出现。笔者在印度一个著名的思想库发言时,发现一些军事研究者还在询问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是否会通过武力方式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类问题反映出这些印度专家还是从“敌对性攻击”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工具性”做法。与此同时,一批笔者采访到的印度专家尤其是军事专家,认为中国不一定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些专家认为中国的“等待”方式有助于遏制印度。印度在边界上浪费的财力和资源使其无法成为世界大国,而只能被限制为南亚地区大国。这一解释方式与笔者接触到的中国专家的理解恰恰相反。大多数中国专家认为,中国很想解决双方的争端,但印方的强硬态度阻碍了双方的沟通,使相关问题不能取得进展。

在这一方面,印度专家的逻辑框架与社会心理学中的“行为体—旁观者差异”相似。^①据他们的理解,印度试图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受到来自中国的限制。它们强调中国的强硬态度和遏制印度的战略阻碍了双方发展正常的关系。为了解释他们对中国立场的了解,印度专家在讨论中往往提到《孙子兵法》和毛泽东思想,并探讨了中国遏制印度的其他措施,如中国过去对印度分裂分子的“支持”或在克什米尔争端上对巴基斯坦的支持立场。相反,印度专家很少分析中国现阶段的立场和宣言。笔者接触过的不少印度专家认为,在中国采取“等待”策略的情况下,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会越来越大。因此,未来印度可能永远解决不了边界问题。面临这种情况,一些印度陆军专家指出印

^① “行为体和旁观者差异”假设,作为行为体时,环境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因此,行为体会找出环境方面的理由来解释其行为,即把行为归咎于环境。而当作为旁观者时,行为体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因此,行为体会找出行为体本身的理由来解释其行为,即会责备行为体。

度应加强自身的实力以引起中国的重视和反应。如果这种想法变为行动,则意味着印度将会实施类似于 1962年实施的“前进政策”,从而不能排除印度先一步动手的可能性。印度专家对边界问题历史的反复讨论,表明他们试图避免过去的错误,包括态度上的被动和没有部署战斗机的战场策略。

(七) 公开的表态与隐蔽的态度

“公开的标题与隐蔽的态度”,其背后的含义是行为体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听众的身份选择如何自己的想法。这种做法背后的理由来自于另外一个概念,即“概念与身份的转变”(relational alterity)^①。根据这样的行为逻辑,在不同的环境下,行为体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会发生变化。同一国籍的两个人会以省或城市来介绍自己的身份,除非双方来自同一省或城市,否则他们会缺乏团结感。但同样是这两个人,当他们面对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时,会以国籍来介绍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自然地出现同情和同胞的心情。

在中印关系中,“公开的表态”和“隐蔽的态度”经常会影响各种不同的交流。实际上,阻碍中印沟通最大的因素来自于中印专家的“公开的表态”和“隐蔽的态度”之间的差距。双方会在会议上和采访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比如,印度专家发言时,经常表现出比较“自大”的态度,而在采访中,当他们谈到印度军力时,会更为克制、缺乏自信。与此相反,在会议发言时,中国专家经常表现出“谦虚”、“克制”的态度,但在采访中他们往往低估印度军力。中印专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印度专家在讨论本国安全环境时总会提到中国的行为。笔者发现,中国专门讨论印度的书籍和文章明显少于印度专门讨论中国的书籍、文章。在印度学者撰写的关于印度安全环境的专著和文章中,若谈到印度所面临的威胁,几乎每篇都会讨论“中国威胁”。事实上,印度任何关于安全问题的作品都离不开中国因素。

中国是印度专家安全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印度军事现代化、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安全环境、大国崛起等方面的文章都会谈到中国。与此相对,中国专家并没有把印度作为安全考虑中根深蒂固的因素来对待。不过,根据本文

^① Dru C. Gladney, "Relational Alterity: Constructing Dungan (Hui), Uyghur and Kazakh Identities across China, Central Asia, and Turkey,"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Vol 9 No 2 1996 pp 445-477

从文献和采访中收集的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中国专家在分析本国安全环境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印度的行为。这一趋势在图-1中有所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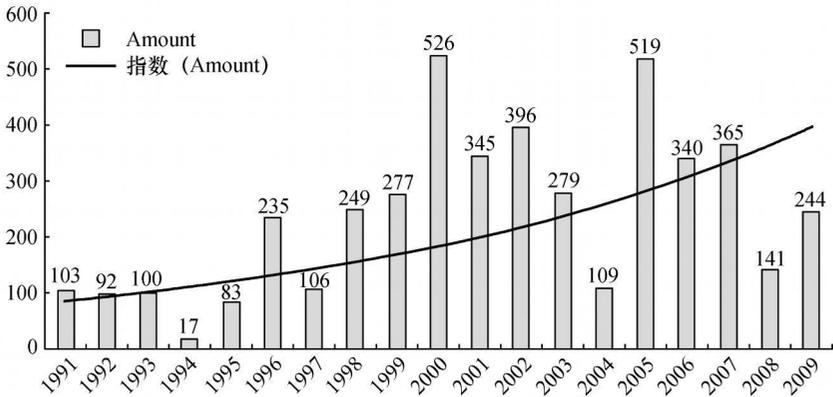


图-1 1991—2009年中国军事期刊对印度的安全关注

资源来源:《兵器知识》、《现代兵器》、《军事建设》、《军事理论研究》、《世界军事》、《现代军事》、《兵器》、《现代军事》、《航空兵器》、《舰船知识》、《现代舰船》、《中国航天》、《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航天》、《航天电子对抗》、《航天器工程》、《固体火箭技术》、《飞航导弹》、《国际航空》、《航空知识》、《航空科学技术》、《航空与航天》、《航空精密制造技术》、《兵工科技》、《军事技术》、《航空精密技术或工程》、《航空测试技术》、《航空动力学报》、《航空计算技术》、《航空计测技术》、《舰船电子对抗》、《坦克装甲车辆》、《兵器科技科学与工程》,时间为1991至2009年。

在中印安全交流中,印度专家比较倾向于通过“公开的表态”来处理双方的问题。与此相反,中国专家比较倾向于通过“隐蔽的态度”来对待双方的安全问题。但最近几年这一趋势开始发生变化,对此,图-1和图-2都有所反映。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军事专家对印度的关注最近十年来发生了变化,且关注日趋增加。从图-2可以看出印度专家对中国的关注度一直很高,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波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虽然中国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但印度专家一直在媒体和文章中批评中国在核供应国集团谈判中的行为。在这种不同方式的压力下,笔者采访过的一位中国军控专家指出,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短文,文章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引起印度专家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应不仅让他吃惊,而且表明中国专家采取“隐蔽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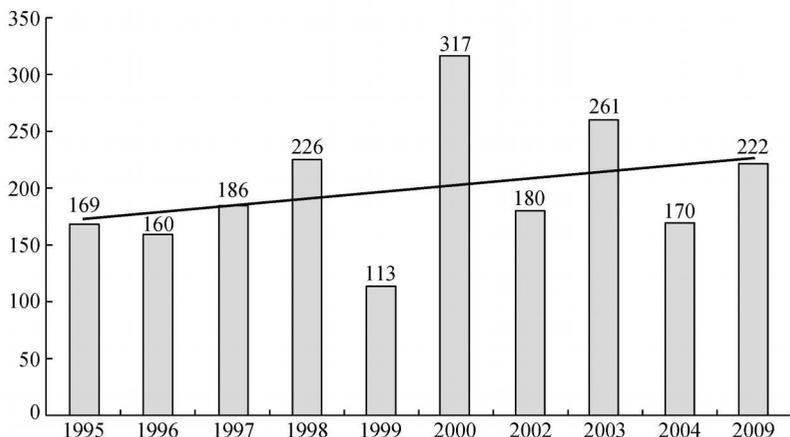


图-2 1995—2009年印度军事期刊对中国的安全关注

资料来源:《印度防务评论》、《印度三军联合研究院杂志》、《国防与科技》、《国防科学杂志》、《战略分析》和《印度季刊》,时限为1991至2009年。

与印度前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 (George Fernandes) 过去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讲话相比,我们发现,中印专家在交流和沟通方面存在较大区别,中印的对立表态方式导致双方沟通失衡。虽然“公开的表态”有时会导致摩擦,如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关于“中国威胁”的声明,但是一些中国专家的交流方式,具体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回避中印安全关系中的难点,这并不利于双方的政治和经济交流。与此同时,也不可忽略“隐蔽的态度”。笔者参加复旦大学2009年的《中印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之间》会议时,一位研究中印安全关系的中国专家在会上强调,他并不认为印美战略伙伴关系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是针对中国的,但他在笔者进行的采访中则采取完全相反的立场。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如果双方一直无法真正了解对方的不满,就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并降低对方的误解。

针对本文谈到的中印军事、科技、政治学者的不对称认知,最重要的是要促进沟通,否则双方的摩擦难以避免。在采取任何措施前,需要首先承认“公开的表态”和“隐蔽的态度”都具有一定的风险。一方面,在谈到真正的认知和威胁感时,对方都有被攻击的感觉或反应。当乔治·费尔南德斯把中国称为印度的“头号威胁”时,中国专家不仅感到吃惊,也加深了中国专家关于印度“地区

霸主意图”的讨论。与此相应,缺乏对印度威胁感的了解或对策也会导致未来的误解和摩擦。当一方隐蔽自己的安全认知和威胁感时,另一方就无法预测或了解对方的行为。关于边界问题上的“中国侵入事件”和“印度增兵战略”,双方都认为对方正在采取挑战性的行动以考验对手的能力和决心。当类似的行动开始代替安全问题上的交流与沟通时,由双方的误解导致摩擦或冲突的可能性就自然会上升。

当谈到上述问题时,印度专家一脚站在双方安全关系的过去,而中国专家一脚站在双方安全的未来。虽然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在继续向前发展,但两国在安全立场上的距离却在增大。中印政治和经济关系也会受到安全问题的深刻影响,例如印度对中国科技和电子公司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障碍不仅是政治或经济上的问题,印度专家指出,印度担心中国通过双方科技交流进行间谍活动或展开网络战等相关行动。印度认为中国在巴基斯坦或缅甸建设的便利能源和货物运输的港口不只是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不少印度专家认为这些港口和监测站为中国提供了进入印度洋,并侦察印度军事行动的前哨站。忽略这些问题领域的安全因素会导致经济和政治上的损失,如中国华为公司与中国解放军过去的联系,对它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印度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India Pvt Ltd)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促进双方在安全上的了解和沟通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否则,这两个崛起中的大国会发现,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会一直面临长期的障碍,甚至存在着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四、结 论

社会心理学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印专家在交流与沟通方面的差异。上面提到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在中印安全互动中都有一定的体现。“基本归因错误”、“行为体和旁观者差异”和“认知失调”,这三个概念都涉及行为体对自身行为的解释。不过,前两个概念涉及的范围更广并有更强的对比效果,因为他们解释了行为体自身以及对方的行为。在中印安全关系中,前两个概念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专家倾向于用“霸主”、“大国梦”等词汇来描述印度的“远海”和

“蓝海军”愿望,并同时用“国家安全”、“经贸利益”等话语来解释自身同样的行为。^①

“先入为主偏见”、“过度自信现象”和“受害者心态”这三个概念都概括行为体对对方根深蒂固的判断和认识。这些概念一般与历史上的趋势有关,因此它们较难改变。在中印安全关系中,这些观念受到1962年冲突的很大影响,并进而塑造了中印在各个外交层面的交流,包括中国专家轻视印度专家的“中国威胁论”和印度专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怀疑。“修订历史”、“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两个概念描述行为体在国内所追求的民族团结和生存动因。与此同时,在两个行为体的互动中,它们可能会导致摩擦或不稳定。在中印安全互动中,印度关于中国的“受害者心态”是其安全团结和民族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在重复探讨和修订历史悲剧的过程,以及在实行边界增兵和类似行动的过程中,印度的行为可能会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这种可能性在边界问题上最为突出,即印度增兵、增加苏-30MK I战斗机的部署等行动可能导致双方之间的摩擦或偶然的前哨战。

“社会身份”概念与中印安全问题的联系,表现在当两个国家的“社会身份”和“国家利益”变得更一致时,双方的合作领域会增多。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的摩擦领域也可能会增多。在中印安全关系中,双方正在追求“海军强国”利益和“世界大国”的身份。虽然双方在反海盗、国际组织等领域上进行着合作,但在追求同一种利益的过程中,双方也可能会遇到资源稀缺的问题,从而形成竞争的态势。

“公开的表态”、“隐蔽的态度”、“敌对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这几个概念对中印安全关系的相关性体现在,缺乏对前两者的了解会导致对后两个方面的错误判断。在中印安全关系中,由于印度专家不够了解和怀疑中国“公开的表态”和“隐蔽的态度”,导致其从“敌对”的视角来预测中国的决策。由于中国专家轻视和不了解印度“公开的表态”和“隐蔽的态度”,他们也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工具性”视角预测印度的决策。这一情况的危险在于,印度专家倾向于认为中国的行为是敌对性的、挑战性的,并可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而中国专

^① Major Gen. Vinod Saigal “Dealing with Chin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the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of India*, Vol 129 No 536 April-June 1999 pp. 179-189

家会认为印度的行为是工具性的,缺乏敌对的威胁感,从而采取轻视或忽略印度担忧的措施。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导致安全摩擦的循环。

笔者在中国和印度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社会心理学概念对于理解和分析国际关系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虽然这些概念最初是探索个人的心情和行为,但它们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专家的判断和国家之间的交流。杰维斯很早就意识到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过,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两个概念之上,而忽略了社会心理学中丰富多彩的理论。本文则试图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对中印安全关系的探讨。

由于每个概念所讨论的问题及代表的机制不同,因此很难说它们有什么高下之分。不过,对于本文讨论的议题来说,有两个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公开的表态”和“隐蔽的态度”。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在上述所有概念过程中都起作用。一些概念在中印交流中起作用的方式是“公开”的,另一些概念在中印交流中起作用的方式是“隐蔽”的。前者是“一轨”外交的交流方式,后者是“二轨”外交的交流方式。当危机出现时,“隐蔽的态度”的作用就会上升。为了真正了解两个国家的安全关系,尤其是两个历史上曾经发生摩擦和冲突的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我们必须去了解它们之间“一轨”和“二轨”的互动。中印安全关系的典型性在于,双方的“公开的表态”和“隐蔽的态度”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为了进行更充分的分析,笔者的研究资料的来源包括“公开”的材料,如军事、科技和学术期刊,和“隐蔽”的材料,如采访和会议。在具体的研究中,本文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印度专家对中国的认识上。

上面的分析表明,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机制不仅在中印安全关系中发挥作用,而且不同的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并不一样。这些社会心理学机制作用的后果,可能会加深双方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误解。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研究认知问题和社会心理学,并把相关研究与国际关系结合起来就很重要。即使对于“认知”问题的研究,有时也不一定具有很高的精确性。无论“认知”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合,它都是行为体进行判断和采取行动的基础。因此,有时“认知”比“现实”更为重要,能对行为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从而需要国际关系学者予以更充分的研究和关注。同时,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吸收和容纳社会心理学机制,也可以扩大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和解释力。

作者简介

秦亚青 外交学院教授。现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1994年在密苏里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代表著作有：《东亚地区合作》(主编, 2010年)、《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合著, 2009年)、《观念、制度与政策: 欧盟软权力研究》(主编, 2008年)、《权力·制度、文化: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2005年)、《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1998年)。

电子邮件: yqqir@cfau.edu.cn

司乐如 (Lora Szalmán) 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2010年6月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 2004年6月在蒙特雷研究院获硕士学位, 1995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获学士学位。2004年12月至2006年7月在非政府组织威斯康星核军备控制项目从事研究工作。

电子信箱: sileru3@gmail.com

陈琪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2002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7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chenq@mails.tsinghua.edu.cn

周舟 现在广东省中山市电信公司工作。2010年在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2007年在暨南大学获国际政治专业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zhouz07@mails.thu.edu.cn

唐棠 现在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工作。2010年在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2006年在浙江大学获信息与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ultimatetang@gmail.com

齐皓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2006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2004年在黑龙江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环境机制理论。

电子信箱: qi-h06@mails.tsinghua.edu.cn

左超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2009年在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leftgrass@sina.com